

专家评说

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笔者赞成一些学者的判断，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是双重的，一半是市场经济，一半是统制经济。所谓统制经济指的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即政府垄断的经济。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晏智杰

统制经济仍起支配作用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协调、不均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问题根源何在？笔者认为，说了多年的“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之所以进展缓慢；呼声甚高的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之所以踏步不前；反腐倡廉之所以收效甚微，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归根到底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笔者赞成一些学者的判断，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是双重的，一半是市场经济，一半是统制经济。所谓统制经济指的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即政府垄断的经济。就产权制度改革来说，改革进展主要体现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即民营经济的发展；原有体制内的改革则主要体现在中小型企业国有企业的改制。至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如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以央企为主体的大型国企（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则仍然处于政府垄断的地位；各级政府掌握着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的流向的巨大权力；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



“瞎胡闹”的村级市好得很

“西辛庄市”以最低成本打造出了一个“微型城市”，有效地凸显着农民们久欠盼望的“三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工入化、农业产业化，正在颠覆着传统的城市化思维，开辟着新型城市化思维的新边疆。

■ 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研究员 教授 管益忻

河南濮阳县西辛村庄于今年 5 月 8 日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第一个村级市。不少专家说这是“瞎胡闹”，笔者却不以为然。

这个被当事人谓之曰在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大型的农村社区”实乃一个最小的市，它是把 15 个村庄近 2 万户村民整合到一起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无公务员，又无行政机构的“城市”中，学校、医院、宾馆、超市、水电气……城市应有的基础设施同样都拥有，行政关系不变。

毫无疑问，这种“村级市”是农民向往城市、就地城市化的一种重要尝试，是中国新型城市化的一个原创性模式，是市场经济下城镇化东方版本的一个富有原创意义的积极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好得很！其一，它反映了农民千百年来，通过城市化这种空间形式来提高自己生活品质的迫切欲望。

其二，它为打破行政体制局限给出了一个微观的样本，尽管它眼下仍维系着原有行政关系。

其三，它适合农民欲望，契合着农民对自身生活方式演进的理想和理念轨迹。

其四，它的产业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符合初始原生态，一个小产业单元要求，有利于产业发展。

其五，它突破了城镇化之常规，这可视为一种新型的“逆城市化”。

“西辛庄市”以最低成本打造出了一个“微型城市”，有效地凸显着农民们久欠盼望的“三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工入化、农业产业化，正在颠覆着传统的城市化思维，开辟着新型城市化思维的新边疆。

特别应强调的一点是，“村级市”一建立，便立马改变了这里居民的“身份”，非农化的实现意义特别重大。话说到这里，笔者要提到这样一个值得参酌的事实——高度工业化的日本，农民已减少到只占全部人口的 4%了，但住在农村的居民却高达全体国民的 25%。

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我们知道，垄断必然排斥竞争，垄断必然滋生腐败，垄断必然造成社会不公，这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矛盾、冲突和问题的最大根源。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如果不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就还是很不确定性的。

“政府主导、市场受控”是中国模式吗

然而，有人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深陷危机之际，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则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典型，即所谓“政府主导、市场受控”，有人甚至主张将它定型为所谓“中国模式”。对此论断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这些年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恰恰不在于“政府主导、市场受控”，而是在于与其方向相反的改革开放。例如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小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制，对外贸易的增进，大力引进外资，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等等。

第二，不应该忘记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即以政府所有制为表现形式的公有制与国有制，虽然在一定时期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就长期来说它的效率是低下的，甚至到一定阶段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致命弊端。

第三，仅仅强调 2008 年后中国政府采取反危机措施（主要是中央政府投资 4 万亿元）所取得的正面成效（平稳度过了金融危机），却无视其明显的负面效应（地方政府债务沉重，信贷猛增直接带来通货膨胀等），显然是一片片面的近视的观点。

因此，不能赞同“政府主导、市场受控”的观点，而应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还能延续多少年

■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 张汉亚

改革开放之后，在 1979 年—2011 年的 33 年中，我国经济(GDP)年均增长达到 9.89%，其中 2003 年—2011 年的 9 年中年均增长高达 10.85%。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这种 9%以上的快速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如日本，在 1955 年——1972 年的 18 年快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达到 9.8%，但进入上世纪 70 年度中期之后，年均增长就下降到 6%以下，90 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一直在 1%左右。我国的经济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在 9%以上，这种高速增长究竟能够再保持多长时间，是各方面关心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的快慢主要取决于投资的增长

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固定资产投资（以下简称：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消费和出口提出需求，由投资建设相应的生产能力予以满足，但投资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还具有提供新产品，引导消费和出口需求的功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可供消费和出口的社会产品种类的数量迅速扩大，过去闻所未闻的新产品层出不穷，都是投资建设的结果。

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无疑是与投资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分不开的。因此，今后还能够保持多长的时间快速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的快速增长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1. 投资建设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保障条件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通信、水利、房屋等设施）和基础产业（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建设投资。这类投资的特点是：项目建设所需要的投资量大，建成后使用期长，更新速度慢。这一点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表现最为明显，如电力、公路、铁路、机场、通信、水等具有网络特征的基础设施，受国土范围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增加；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机械设备等基础产业的产品在满足国内需求之后，可以通过出口继续增长，但要受到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限制，发展也有极限。如美国、日本等国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年钢产量都达到 1 亿吨以上，但之后都下降到 8000 万吨以下。

另一类是直接供人们生活消费使用的各类产品生产和服务行业建设投资。这类投资的特点是：单个项目投资量相对较小，由于竞争激烈，产品更新快，在建的项目数量众多，对投资的需求相对稳定，但与前一类建设相比，每个行业对全社会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变化的影响较小。

2. 投资不可能永远持续快速增长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和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实际看，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的高峰期一般是发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镇化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现程度，主要取



持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方向不动摇，维持现状和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当务之急在于排除特权，垄断或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铲除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使公权力的行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否则就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泥潭，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乃发展之必需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尤其迫切需要深化对市场经济性质的认识。认为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的传统观念早被打破了，然而，以为市场经济是私有经济，它姓私不姓公，它总是同私有制相联系，其动力是个人利己本性等观念，事实上还支配着人们的头脑。这是对市场经济制度本质的严重误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固然要以明晰的产权为基础，然而市场交易要得以实现，必须要为市场即公众提供适用的商品或服务，否则获利目的必然落空。恰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所说，市场经济并非纯粹利己经济，也不会是单纯利他经济，而是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经济形式。这种利己当然不是损人利己，而是个人所拥有的合

法权益；这种利他也不是空洞的脱离历史条件的纯粹利他，而是交换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客观需要，是利己的延伸和表现。可见将市场经济的本质理解为单纯利己主义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主体归结为所谓“经济人”，而“经济人”的根本特征据说就是怀抱利己动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观点既违背事实，也不合乎民意。否则市场经济制度就会成为一群以邻为壑的宵小之徒，成为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杀戮之地，它怎么还能在世界上存在和发展到今天，甚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它的终点。事实证明，成熟的或法治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和所培育的经济主体的人格，恰如亚当·斯密所说，既不应是极端利己主义，也不应是纯粹利他主义，而是合理利己主义和高尚利他主义的有机结合。

在笔者看来，只有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人性以及美德的标准，才能为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情操的结合与统一奠定科学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否则，在经济生活中一味追求利己主义，而在思想道德教育中一味高唱利他主义，只能扩大和加深两者之间的距离和鸿沟，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就难以变成现实。



决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完备程度，其完备之时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之日。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对投资的需求增长必然下降，经济也不可能再保持快速增长。目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的投资和经

济都长期保持低增长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的必然结果。

我国目前处于向工业化和城镇化转变时期，也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加快建设

和各种生产能力快速增长，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加快改善的发展阶段，今后几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因素都要求经济

和投资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但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需求不会再有较大的增长，对投资的需求将急遽减少，导致全社会投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放慢。

二、我国经济还能快速发展多少年

我国在 2002 年以后进入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新的高峰期，其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高达 70%左右，这些产业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投资的快速增长，进而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电力、电信、公路、钢铁等行业的建设都已过了投资的高峰或快速增长期，近两年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但还有城市设施、水利、铁路、设备制造、房地产等许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还处于投资的高峰期，全社会投资仍然要保持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并推动我国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我国各级政府为“十二五”时期制定的建设项目规划表明，主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完善最多再需要 5-7 年的时间，就是说大约在 2018 年左右就将结束投资的高潮期。之后，投资的增速将明显下降，由于其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必定使全社会的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再保持在 9%以上，可能会快速下降到 6%以下。即使我国在今后几年放慢投资建设的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保持在 8%左右，到 2020 年的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到 6%以下。

三、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经济和投资的增长将如发达国家那样，主要取决于消费和出口的需求，投资将根据这些需求的变化而发展。届时支持经济发展的投资主要用于以下 6 个方面：

（1）各类产品的创新投资，包括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新产品的生产线建设等等。

（2）各类适应人们生活消费变化和能够引导人们消费的产品生产能力建设。

（3）服务业的建设。无论是生产服务业，还是生活服务业的需求都是要不断发展的。起作用最大的可能是生活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4）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建设。

（5）新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建设。

（6）产业调整和弥补折旧生产能力的建设。

城镇化是推动从外需主导 向内需拉动转型的持久动力

加快城镇化发展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实现短期宏观政策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有效结合点，是中国未来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董小君

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中国善于抓住历次全球格局重大调整机遇，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陷入“滞胀”，产业急近需要升级，中国抓住机遇，及时打开放国内市场，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终结亚洲“四小龙”神话，给了中国超越亚洲四小龙的机遇，中国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战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是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上“9·11”事件，中国获得 10 年左右的和平发展国际环境，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中，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四次便是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了中国大大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距离的机会。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急剧的变迁中，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新的动力源。可以说，城镇化不仅是世界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后遗症的主要驱动力，也是中国未来经济从外需主导向内需拉动转型的持久动力。

首先，城镇化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城镇化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给经济增长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我国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原始数据测算（按现行价格计算）：2011 年，农村劳动生产率为 11778 元/人·年，城市劳动生产率为 118018 元/人·年，城市部门劳动生产率是农村的 10 倍。这个差距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揭示了这样的规律：农村劳动力的及时、有序转移，将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城镇化把已经进城和将要进城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接近城市劳动力的水平，会提高整个经济竞争力。

其次，城镇化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城镇化蕴含巨大内需。消费理论表明，收入水平低的人群往往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在中国，城乡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情况基本符合这一理论。例外的是，农民相对市民，虽然收入水平低，消费倾向也低。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6977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810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 3.13:1，收入差距制约着农民的需求。大量研究表明，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对工业产品和劳务的消费需求存在着落差，目前，占 2/3 的中国农村人口在全体居民消费中所占的份额不足 1/3。因此，根治内需不足的药方不在农村，而在于推进城镇化。据测算，城镇化率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1%，则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将提高 1.5%；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 1.4 个百分点。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地增长。

第三，城镇化对就业、投资和 GDP 的拉动有着综合效应。“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五年，我国城镇化率要从 2010 年底的 47.5%提高到 51.5%。也就是说，到 2015 年，将有一半多的人生活在城镇。照此速度，到 2030 年，我国城镇化率有望达到 65%左右，城镇新增人口 3 亿多，这将为就业、投资和 GDP 增长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

因此，加快城镇化发展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实现短期宏观政策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有效结合点，是中国未来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